

碑

林

刊集

西安碑林博物館編



碑 林

集 刊

(三)

1995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3 号

1998. 10. 7.
编者赠阅

碑林集刊〔三〕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41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5368—0768—6/J·648

定 价: 38.00 元

顾 问：邢忠强 苗向阳
李林娜 刘西林
吴梓林
主 编：高 峡
副主编：王原茵 王其祎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日本国首相村山富市来西安碑林参观。图为村山富市首相在展室亲手推拓唐僧怀素草书《千字文》碑。



韩国总理李洪九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来西安碑林参观。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在西安参加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代表来西安碑林参观。图为代表们参观“陕西古代书画精品展览。”



(本页摄影：罗忠民)

明·董其昌(1555—1636)
草书扇面



清·翁同龢 1830—1904) 楷书对联	清·王文治 (1730—1802) 行书条幅
-----------------------------	------------------------------

野行所至寓高情

翁同龢

小坐偶然得静趣

寶山山人

水國冬常暖 經寒春始迴 煙迷
黃鶴渡 雪壓白牙臺 舟小衝江
去 鴉多扶雨來 不須矜白我 祇
取老懷開

除夕大別山雪眺之作
夢樓王文治

目 录

●碑林史话

- 金元时期的碑林 路 远(1)
 抗战中陕西考古会及西安碑林部
 分文物移藏始末补述 罗宏才(22)

●碑志考略

- 曹魏正始石经概述 李林娜(36)
 隋《马稚墓志铭》释读 田中华(43)
 唐《李制墓志》考释 陈尊祥 郭盼生(47)
 唐《李思摩墓志》考析 岳绍辉(51)
 读三方唐突厥族人墓志 陈忠凯(60)
 唐代公主墓志辑略 王其祎 周晓薇(63)
 唐法琬禅师墓志、墓碑及有关问题 樊 波 李林娜(78)
 唐《冯君衡暨妻麦氏墓志》考述 张伯龄(83)
 读《唐高元珪墓志》 贺 华(87)
 唐“开成石经”补字概述 芦桂兰(90)
 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 马咏钟 张安兴(98)
 西安西郊出土的后唐《张居翰墓志》 马志祥(102)
 明官箴刻石考释 李文林(108)

●石刻艺术

- 关中北朝造像碑研读札记 李 崧(112)
 碑林藏佛道合刻造像及道教造像 裴建平 李雪芳(127)
 造型艺术中之线条美
 ——试析陕西石刻艺术室中三尊造像 王 蓓(135)

●碑帖咀华

- 碑帖谈丛 黄永年(139)

●碑志鉴评

- 纪《唐迴元观钟楼铭》
——兼论柳公权及其书法 翁闾运(143)
- 西安碑林十碑评略 高 峡(146)
- 《道因法师碑》及其书法浅评 倪丽晔(158)
- 西安碑林名人题记三则 田福宝 罗小幸(160)

●书艺漫笔

- 再论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美学地位 张建华(163)
- 试论篆书在中国书法上的影响 吴梓林(173)
- 也谈“正体变态之宗” 罗坤学(179)

●读史札记

- 唐志补史 贺忠辉(186)
- 从《法琬法师碑》看唐代佞佛之风气 景亚鹂(197)
- 关于《昼锦堂记》碑的几个问题 王原茵(200)

●文物丛谈

- 古代铜镜纹饰艺术 赵力光(205)
- 关于昭陵六骏被盗真象的几个问题 郝 林(220)

●玺印研究

- 碑林旧藏古官印考略 陈根远(226)

●博物馆学

- 西安碑林文物古建筑防火问题初探 苗向阳(234)

●诗词咏胜

- | | | | |
|----------|----------|----------|----------|
| 宋伯鲁(243) | 张凤翔(243) | 范紫东(243) | 吴 宓(243) |
| 朱 德(244) | 郭沫若(245) | 郁达夫(245) | 张恨水(246) |
| 张大千(246) | 茹欲立(246) | 赵朴初(246) | 汪 锋(247) |
| 曹 禺(248) | 胡 绳(248) | 孙轶青(248) | 吴调公(248) |
| 林散之(248) | 张 过(249) | 吴丈蜀(249) | 徐山林(250) |
| 霍松林(250) | 翁维谦(250) | 张 越(251) | 姜国宪(251) |

武复兴(251)	曹伯庸(252)	唐伯康(252)	李炳武(252)
甄宜迈(254)	王 安(255)	陈辉汉(255)	王其祎(256)
韩舒柳(256)	姚 平(256)	徐志诚(257)	马新民(257)
高 峡(258)			

●补白

碑(启功·62·)《语石异同评·陕西石刻》二则(柯昌泗·101、138·)
大夏石马(黄小芸·82·)景云钟(罗宁丽·204·)

●书讯

《秦始皇陵兵马俑》(张芸·77·)《陕西碑石墓志资料汇编》(杨永兴·182·)

● 碑林史话

金元时期的碑林

路 远

从唐末到北宋,在唐石经先后三次迁置过程中,作为保存历代碑刻之特定场所的碑林,终于形成。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吕大忠将唐石经迁至“府学之北墉”时,除《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外,还有“颜、褚、欧阳、徐、柳之书,下迨偏旁字源之类”陈列于“庭之左右”^①,碑林已具雏形。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虞策将府学、文庙和其中唐石经及诸多唐宋碑刻,由“府城之坤维”迁至“府城之东南隅”,即碑林现址,并大兴土木,“庙学之成,总五百楹”^②,为碑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此时距“靖康之变”,金灭北宋(1127年)只剩下24年,北宋已来不及再对碑林有所建树。也就是说,碑林创建伊始,尚未及有大的发展,便迎来了历史的巨变。自此,关中地区乃至整个淮河以北中原地区,进入了金朝女真族统治之下。其后,又是元朝蒙古族对整个中国的统治。金、元两代统治关中前后延续240余年。刚刚打下基础的碑林能否存在下去,这里的碑石能否避免《熹平石经》、《正始石经》那样的厄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元两代异族统治者对汉入儒学文化的态度和相应的文化政策。所以说,这一时期是碑林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本文拟根据现有资料,对碑林的这段历史作一个概要的回顾。

一、金元两代全国和关中的形势及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公元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前后几十年,便完成了建国、灭辽之大业,并迫使西夏称臣,一个生机勃勃、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强国,迅速出现在已极度腐朽的赵宋王朝面前。天会三年(1125年),金太宗完颜晟下诏伐宋。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宋徽宗退位,钦宗继位。是年冬,金国宗翰、宗望二路大军会于开封城下,城破。次年4月,掳徽、钦二帝及大量人口、财物北归,北宋灭亡。5月,康王赵构在商丘继皇帝位,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天会五年(1127年)冬,宗翰率金军挟灭亡北宋之余威,挥师西进,攻取郑州、洛阳、襄阳等地,又分兵派娄室所部金军一路攻入陕西,连下同州、华州、京兆、凤翔等地。此后,陕西关中地区便成了西线宋、金之间反复争夺的主要战场。直至天会九年(1131年)10月,宋军于大散关东和尚原挫败企图沿蜀道攻取陕南、四川的金军,西线局势方才稳定下来。从此,东起淮水,西至秦岭,形成了宋、金之间一条暂时分界线,金朝开始确立其在陕西和淮水以北地区的统治。

女真族立国之初,其社会制度刚刚由氏族部落制转化为奴隶制。短短几十年,便获得了原辽、宋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如何在这居住着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和不同历史

传统的广阔区域内实施有效统治,对他们来说,要比马上驰骋、攻城掠地困难得多。是保持女真族原有的奴隶制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适应汉族地区状况,采用封建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女真族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激烈斗争。随着南侵战争的不断发展,从金太宗时起,金朝原有的政治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原女真族部落故地,及原辽统治下的契丹、渤海等族居地,仍实行金朝制度。在原辽占领下的山西、河北即燕云十六州汉族地区,维持辽朝时统治制度不变。在原北宋统治下的淮河以北包括陕西在内的新占领区,则采用立刘豫(原宋济南知府)为子皇帝、扶植伪齐傀儡政权的办法,基本上仍行北宋时制度。天会十三年(1135年),金熙宗即位。这位自幼学习汉文,“尽失女真故态”的年轻皇帝在位15年间,依靠朝廷内革新派支持,实行改革,采纳辽、宋旧制,统一了金朝内地与汉地的官制,并废除刘齐,依照汉地原有封建秩序,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和降臣士族直接进行统治,以加强中央集权,显示出进一步接受汉文化的趋向。海陵王即位(1149年)后,展开更为激进的改革,全力推行封建化,镇压贵族反对派,并迁都燕京,发动对南宋的战争,企图建立统一南北的封建政权。为达此战略目标,海陵王努力从政治上、文化上消除民族间的对立,争取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支持,大量任用汉官,吸收汉人、契丹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他还迁移大批女真贵族、平民南下授田耕种,使女真猛安、谋克户散处于汉民村落之间,加速了女真族奴隶制的消亡和封建化进程。海陵王的统一事业虽未实现,但其改革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成果经金世宗一朝巩固发展,为以后各代所继承,奠定了金朝封建统治的基础。

在对待中原汉文化的态度上,女真人较契丹人积极得多。金兵攻陷汴京时,在搜刮金银财宝、宫妃妇女的同时,也搜集图书典籍,并征太学生30人随军^⑧。北宋灭亡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官吏散亡,急需汉人文士为新政权服务。天会五年(1127年),金太宗重开贡举,因辽、宋所传儒家经说不同,设南、北两举场分别考试,称“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中都)后,遂合南北试于中都举行。正隆元年(1156年)定三年一贡举制度,以五经三史命题。以此,金朝科举制走上正规。在学校教育方面,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置国子监。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置太学,由礼部主之。同年置州府学,由提举学校官主之。《金史·文艺列传》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⑨不仅汉族子弟习读儒家经典,世宗之后,女真人也普遍学习汉文化,汉语始终是通用语言。虽然后来也设女真学校,开女真科举,取女真进士,以女真字翻译经书,但毕竟不是主流。

由于金朝统治者采取了正确的统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女真族较快地完成了封建化过程,中原地区的封建秩序得以恢复,封建经济得以复苏。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事业出现了新的繁荣。

蒙古族诸部落兴起了漠北草原,并能对四邻构成威胁,是12世纪末的事。1206年,帖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被推举为全蒙古的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家,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大舞台,并对中国各民族历史和欧、亚许多国家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成吉思汗建国后,侵掠矛头首先指向南面的金朝。短短几年,便席卷了黄河以北整个华北平原,围困中都,迫使金宣宗南迁汴京,并于1215年攻陷中都。其锋芒所向,曾破潼关、攻延鄜、入关中,凤翔被围,京兆告急。成吉思汗在南侵的同时,还派军西征,灭西辽、花刺子模。1226年,他亲率大军进攻西夏,并分兵再度长驱入陕,围攻凤翔,直指京兆。次年六月,西夏投降。不久,成吉思汗病故,形势才告缓和。此后几年间,直至1231年凤翔城破,京兆弃城,陕西地区又成了

蒙、金之间的重要战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以及后来的蒙哥、忽必烈等,完成了成吉思汗未竟之业,继1234年灭金之后,又灭大理,降吐蕃,并于1276年灭南宋。其间曾大规模西征,东征,侵掠的铁蹄几乎踏遍了当时的整个文明世界,建立起横跨欧亚、幅员广阔的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一年后又定都于此,替代和林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蒙古建国之初,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相当落后,虽有奴隶制存在,但基本上还是父权制的氏族部落制。只是随着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掳掠大量人口为奴,奴隶制才得以充分发展。蒙古奴隶主在征服各民族、特别是在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文化的影响,为巩固其统治,不得不逐步采纳和保持汉族地区原有的封建社会制度,不得不采用与此相应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但由于蒙古贵族保守势力的强大和统治集团内部行汉法与反汉法的斗争反复进行,直至元朝灭亡,其统治者也未尝象辽、金那样趋于汉化。历代蒙古皇帝没有一个真正通晓汉语文的。元朝统治时期,在经济领域,蒙古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注入了汉族地区尤其是北方的封建经济的机体,形成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局面。在政治制度上,既不同于辽代的“国制”与汉制并行,也不同于金代的全盘接受汉制,而是在沿袭金、宋制度的基础上,保存了某些蒙古旧制,加以改造,始终贯穿着民族等级制的原则。在文化政策上,一方面打起尊孔崇儒的旗号,实行科举,兴办学校,延揽汉族士大夫为其统治服务,一方面又猜忌和排斥汉官文士,摧残汉族文化。总之,元朝统治者表现出远比辽、金两代更为强烈的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的特点。

在元代一百多年间,改革派和汉化趋势也常常占有上风,这往往是比较开明的君主执政之时。建立元朝,完成统一大业的元世祖忽必烈,就是这样一位开明君主。忽必烈从青年时代起便广交中原文士。1251年蒙哥即位后,命其治理原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汉族幕僚集团,使其深受影响,趋向于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制度,并以汉法制理中原。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京兆封地。他建立京兆宣抚司,任用杨维中、廉希宪、姚枢、商挺等儒吏,减关中常赋之半,打击豪强,下令释放被俘为奴的儒士,建郡县学,深得人心,促进了关中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依照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称皇帝并建元“中统”。在他进行官制改革后任命的中央和地方大员中,多是其汉人幕僚。

元朝建国时期的战乱和奴隶制的注入,使北方和两淮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遭受极大破坏。忽必烈即位后,开始重视农业,采取了开垦荒地、军民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增加农田面积,恢复农业生产,在其领导的灭宋战争中又注意保存江南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所以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在江南地区则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在关中地区,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当局把泾水沿岸的牧地数千顷分给贫民屯种,官给牛种田具。后来又把周至、泾、邠、乾及安西王属县的闲田设官屯种,使荒弃和强占为牧场的土地逐步得到利用^⑥。此外,元代还产生了官方颁行的《农桑辑要》(1273年)、王桢《农书》(成书于1313年)、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成书于1314年)等3部著名农书,说明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视。元代在手工业方面的显著成就是棉织业的发展,此外,印刷业、制瓷业、火器制造业均较前代有大的进步,元朝幅员广阔,交通发达,中西文化交流得到增强,促进了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总之,元朝的社会经济在经历了前期的破坏之后,依旧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着。

元代的科举取士之制开始得很晚。在统一之前，窝阔台在位时，听从中书令耶律楚材建议，于1237年下诏诸路考试，录取4千余人，但此后中断了70多年，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才正式颁行科举制度。不过，元代的学校教育却相当发达，尤其是郡县学校，地方教育始有专门官员（提举学校官）、专门机构（诸路提举学校所）负责，而且州县学田岁入自掌，有了独立经费的保障。据《续文献通考》载，元世祖时州县学校的数目为：“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二万一百六十六所；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二万四千四百所；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二万一千三百余所。”^⑥这数字的确大得让人生疑，但用它来说明元代州县学校之盛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还有各地的书院。元朝统治者通过诏令建书院和委任山长的办法，使原本为私立的书院官学化了。仅《续文献通考》载有其名的书院就有40所^⑦。

总而言之，元朝社会虽然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倒退落后的因素，但并不是一团漆黑，在许多方面仍有突出的成就和积极的贡献。如在文学上有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史学上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地理学上有《元一统志》和朱思本的《舆地图》；在天文历法上有郭守敬的《授时历》等等，那么，收藏着儒家经典——石经的碑林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在元朝统治期间能得到保护，使之延续，应该是在情理之中了。

二、金代对碑林、府学和文庙的整修

在金代，仍沿用北宋之旧，称今之西安为京兆府。金代对碑林、府学及文庙的整修，根据现有资料，共有4次。其中专门整修碑林者1次，整修府学、文庙者1次，整修府学、文庙兼修碑林者1次，另有1次因记事碑毁失，只存碑目，具体整修情况不详。此外，正大八年（1231年）尚有一次石经“迁徙”之举，事关碑林历史，在此也一并述之。

1、贞元三年（1155年）重修府学、文庙

对于此次整修的认识，主要依据金正隆二年（1157年）所立《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此碑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5室，李栗撰文，潘师雄书，钱义方篆额，来昌国立石，碑文保存完好。关于整修的起因，碑文在叙述了前宋崇宁间重修庙学之盛况后，写道：“自罹兵革，残毁几尽。贞元乙亥岁，河间韩公希甫亚尹京兆。视事之三日，谒奠于文宣王，酌献礼毕，见诸生于学，喟然叹曰：‘我国家经文纬武，进用贤能，每三岁设科，以经史取士，乡升之府，府升之朝，而皇帝临轩，赋业见贤焉，然后用之，诚夸越复古之制也。谨按尚书省批送礼部节文，应有宣圣庙去处，即便整修。今此庙貌倾圯，黻宇颓弊，何以仰副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即议于府尹完颜公胡女，遵奉朝廷之命，鳩工计役。”这就是说，此次整修是因中央政府有整修文庙之令，加之战乱后京兆庙学已残毁颓弊，于是韩希甫向知府完颜胡女建议整修。贞元乙亥岁为贞元三年，是海陵王迁都燕京（贞元元年）后的第三年，正是他大刀阔斧地实行全面改革，积极倡导汉文化，加速封建化进程的时候。京兆府对文庙和府学的整修，当是金朝统治者积极务实的文化政策在地方上的反映。

关于此次整修的内容，碑文称：“拾墮瓦于废基，抡坚材于坏屋。新寝祠而重俨像，创修廊而绘列贤。师儒讲诵之有堂，生员居处之有庐。以至斋祭之室，庖湏之所，各有其序。补苴罅漏，剔秽治污，期年而成。韩公又出己俸，重修祭器，俎豆之属，大率皆备，乃延诸生入学肄业。”碑文只字未提府学中之石径，看来，这次整修并不包括碑林，只是对文庙和府学中毁坏

的殿庑房舍进行重建或修复,并重绘孔子和列贤画像,添补祭器。这是战乱后的第一次整修,也是宋崇宁年间扩建庙学之后的第一次整修,能够费时一年,工程量大概不小。

参与此次整修的地方官,除上述韩希甫、完颜胡女二人外,碑文提到的还有“漕使李公”、“同知张公”、“副运周公”,未详其名。具体负责整修事宜者,碑文亦有交待:“府推张公仲堪,下车提领教纲,力赞其务。而又府判毕公棣,入幕之初,首督斯举,能事于是。”此外,署名者尚有学正来昌国、斋谕韩观、司书宋端弼、直学任侯、学谕曹谊等府学官员及一些地方官吏。

2、正隆五年(1160年)重修碑院、七贤堂

这次整修的对象主要是当时被称作“碑院”的碑林。距贞元三年对府学孔庙的整修仅晚5年,也可看作是上次整修的继续。其依据是碑林现藏正隆五年刻立的《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碑。此碑由曹谊撰文,郭孝忠书写。碑已残损,碑文前半部完好,后半部缺字甚多。顺便提一句,《寰宇访碑录》著录此碑时,说碑“原在临潼县”,显然有误。碑文不长,为叙述方便,录全文如下:

重修碑院七贤堂记

京兆府学乃唐之太学,暨前宋崇宁岁迁于兹地。宣圣殿后,旧有玄宗序注孝经石台并文宗群经碑院一区。昨自刘齐扰攘,饥馑连迹,继踵学士解散,宣圣庙宇,迨为草莽。彼所谓石经者,虽森然壁立,而严霜烈日,暴其燥烁,淫风涕雨,饱其渐渍,苍苔翠藓之斓斑,牧童樵子之□琢,逾二十载,凡不免湮没于荆榛瓦砾间。会前河中府同知府尹耶律公隆,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周公维甫,被命监修利用。监日二公恭谒庙貌,叹其□露,爰命匠民相与计度,宏模廓度,逾越旧制者一百三十有六椽。而耶律公……周……给,总判吕公应熊,府判毕公棣,户判田公彦皋,度判孙公鼎年……时复诣学,助其犒劳。翌日……总管,由是鸠工并力,自春徂夏,钉头雨集,柱脚云矗,棟影……风,四廊彩覆,远延瑞雾。而蝌蚪篆隶,龟趺龙首之属,始……余,榑工才过半,而……前后瞩望,烂然一新,可谓能始能终者也。初……学舍,人人以为莫大之美,至是二公之绩特与争辉噫……坚石冀传之不朽,公乃加之以翬飞跋翼,使蔽野而……不朽之典,传无穷矣。谊忝诸儒列,亲见美事,未容缄默,敢……□辰采实而书之。学谕曹谊谨记并立石,进士郭孝忠书丹……书宋端弼,直学王丙,学正来昌国。

由于文字残缺,仅据碑文看,尚难确断其何年刻立。但此碑中的人名有5个与正隆二年《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相同,即“陕西东路转运副使周公维甫”(前碑为“副运周公”),“府判毕公棣”、“学谕曹谊”、“司书宋端弼”、“学正来昌国”。这就是说,此碑刻立的时间较《京兆重修府学记》不会相去很远。碑文中说及年代者有两处,一为“昨自刘齐扰攘,饥馑连迹……逾二十载……”一为“□辰采实而书之”。这个“□辰”显然是撰写碑文的时间。查正隆二年前有“戊辰”,即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后有“庚辰”,即正隆五年(1160年),似乎都有可能,究竟是哪一个是呢?金朝立刘豫为齐国皇帝是天会八年(1130年),天会十五年(1137年)即废。这个傀儡皇帝当时虽然名义上统治淮河以北中原地区,但实际上所及范围很有限,将关中地区因金朝发动侵宋战争,两军反复争夺而造成经济凋蔽的责任算到刘豫头上,实在有点冤枉。这显然是碑文撰者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个“逾二十载”,如果按刘齐立国算,20年后是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恰晚“戊辰”2年;如果按废刘齐算,20年后是正隆三年(1158年),恰又早“庚辰”2年,依然两可。所幸《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文中有一句话:“府判毕公棣,入幕之初,首督斯举”。也就是说,在贞元三年整修府学文庙时,毕棣刚刚入幕作府判,那么他以府判

的名义参与重修碑院,就只能是在此后,而不可能在此前,所以,碑文中的“□辰”便只能是“庚辰”,即《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碑文撰于正隆五年,刻立或在其后不久。

此次整修碑院,已录的碑文中说得很清楚,是因战乱之后,府学文庙宣圣殿后的石经“虽森然壁立”,但保护性建筑却已完全毁坏,“不免湮没于荆榛瓦砾间。”既受到日晒风吹雨淋的自然侵害,又有牧童樵子的人为破坏,于是耶律隆与周维甫“被命监修利用”。其整修重点在于重修石经的保护性建筑,并较前有所增建,所谓“逾越旧制者一百三十有六椽”。这些保护性建筑的形式如何,碑文说得不具体,加之后半部碑文不全,不甚了了。据“四廊彩牖,远延瑞雾”一句看,大概是以碑廊的形式对石经及其他唐宋碑刻(“蝌蚪篆隶,龟趺龙首之属”)加以保护的。至于碑石的陈列形式,可能仍依旧制,并未改动。

整修的主持者,是上述耶律隆、周维甫二人,碑文中还列有总判吕应熊、府判毕棣、户判田彦皋、度判孙鼎年等人姓名,应是亦参与此举。具体负责监修事宜者,因碑文残缺,已无法得知。整修工程“自春徂夏”,历时数月。

此次整修是北宋“崇宁建学”之后对碑林的第一次有正式记载的整修,而且是在异族政权统治下进行的,因此在碑林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碑文还告诉我们,碑林在其早期被称为“碑院”。需要说明的是,碑名提到的“七贤堂”,残存碑文不见提及。碑林现藏有北宋末年《新建七贤堂记》残碑,两者所指应为同一建筑。此后文庙之中还有“七贤祠”存在。对此本文不拟加以深究,当有另文进行考证。

3. 贞祐二年(1214年)重修府学

元人骆天骧著《类编长安志》之“石刻”卷中,列有《金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目,只云“贞祐二年立”,未加任何说明^⑥。骆天骧,字飞卿,号藏斋,为世居长安旧家子弟,生于金宣宗末年,入元后于至元年间曾任京兆府路儒学教授,主持府学。其《类编长安志》是取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分门别类,有所删削,并据《三辅黄图》、《雍录》等书及宋、金、元三代有关文献,加以增补而成。所增加的“石刻”一卷,著录了长安及附近140余种碑刻,多是他本人“不惮涉远披荆莽而追访”所得,应是可信的。其中有当时立于碑林(书中称“在文庙”)的唐、宋、金、元诸代碑刻41种,以及当时立于其他地方现已为碑林收藏者7种。骆氏当时身在府学,此间的碑石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所以他的著录较之后代其他金石著作所记应更具权威性,为我们今天了解金元时期碑林的藏石情况及某些重要碑石的迁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贞祐二年《金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的可靠性是不成问题的,至于碑目后未言立于何处。查《类编长安志》“石刻”卷所列碑刻,凡是重修文庙、府学的记事碑,都是只注刻立时间,未说明碑立于何处,这很好理解,骆氏认为不言自明,没有必要再交待。总之,由此可知,金贞祐二年(或在此前不久)对府学曾有过一次重修,可惜碑已毁失,也不见其他金石著作著录此碑,整修的具体情况便无从得知。一般来说,整修府学肯定会同时整修文庙,而对碑林是否也会加以整修,就很难讲,只能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4. 正大二年(1225年)重修府学、文庙、碑林

关于这次整修,碑林现藏正大二年《大金重修府学教养之碑》专门记之。此碑刘涓撰文,杨焕书,张邦彦篆额,碑文保存完好。

此次重修,距贞祐二年之重修府学仅11年,何以如此短时间又要重修?对此,碑文是这样说的:“自兵凶以来,贵胄氏族子弟流离关中者为多,伍庸隶,侷浮民,恣意于蒲博弹弋之间,相与扇慝为恶,未见能善其后也。事有缓而急者,其此之谓乎?闻之府庠贍士田舍,皆前

贤清俸所营，吝而弗与，何以副明天子崇儒设学之意？”这里所说的“兵凶”，应是指当时崛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军南侵灭金战争。1211年，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誓师南下，拉开了灭金战争的序幕。此后几年间，蒙古军的铁蹄几乎踏遍了金朝黄河以北华北平原的领土，大肆虏掠并围困中都。贞祐二年(1214年)5月，金宣宗放弃中都南逃，迁都汴京，气数已尽的金朝离灭亡之日已经不远了。处于战乱中的华北各地士民大量南逃，其中必有许多“流离关中”。不过，在蒙古军南侵过程中，就在这次整修之前的1216年，1221—1223年，蒙古军已两度进军陕西，关中亦不太平。只因蒙古军主力西征中亚，才于1227年再度南侵之前，给了陕西地区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此次整修便是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的。以上引碑文看，流离关中的贵胄氏族子弟不务正业，急待教育约束，而作为教育之所的府学，也早已为地方当局所忽视，正如碑文所说：“及乎妖孛缠次，氛翳元都，素教皇风，开闢未暇”，连“府庠贍士田舍”也“吝而弗与”，经费都不能保证，看样子府学已经名存实亡了。所以，“行省参政金源完颜郡公”便“会参议知府石盞公、尚书张公暨潭府英髦”，而有此整修之议。这位完颜郡公为完颜合达，《金史》有传。1221年冬，蒙古军木华黎部进兵陕西，围攻延安，完颜合达领兵固守，保住了延安城。次年，他因功升任参知政事，行省京兆。这次整修是在他到任后的第三年。据碑文，他任命了裴满蒲，张士贵、裴满世论、高谊等为提举学校官，兀颜德正、邳邦用为教授，整顿了组织，并“发廩粟，出帑资，以为斋盐之资”，解决了经费。与此同时，开始对府学、文庙及碑林进行整修。

关于整修工程本身，碑文说得很简单：“于是檄有司督工役，支倾补缺，联断洗昏，植踏碑于茂草，基废址于鞠蔬。殿宇翬飞，石经堵立，斋厨廊庑，涣然一新。”显然，这只是一次不大的维修工程，未提及有新建、改建项目。其维修范围，从字面上看，既有“殿宇”、“斋厨廊庑”，当是文庙，府学一起维修；既提到“植踏碑于茂草”、“石经堵立”，当是附带也整修了碑林。这次整修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主持地方军政的完颜合达等人能在战争之间歇，仍不忘兴办教育，并有此重修府学之举，已属难能可贵了。整修后仅过了两年，1227年，蒙古军在攻灭西夏之后，再度大举入陕，关陕大地又成了烟尘滚滚的战场。1231年，关中沦陷。1232年，金哀宗逃离汴京。两年后，金亡。

5、关于石经“正大辛卯迁徙”

《类编长安志》“石刻”卷“石经”条下，骆天骧在引用北宋元祐五年《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碑文资料，说明唐末至宋石经迁置过程后，又写下这样一段话：“正大辛卯迁徙，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王公琛奉而起立。至元十四年，碑尽摧倒。天骧与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请灞桥堂邑刘斌而复立焉。”^⑧“正大辛卯”为金哀宗正大八年，即1231年，“庚戌”为蒙古海迷失后执政的第二年，即1250年，时金朝已亡，包括陕西在内的中国北方已为蒙古统治。“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年号，至元十四年为1277年。在这里，我们不谈后两者，先来看与金代有关的前者。

我们知道，《开成石经》及《石台孝经》原在唐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内，经唐末至北宋间三次搬迁，才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迁至“府城之东南隅”即碑林现址^⑨。这里，骆天骧又记下一个“正大辛卯迁徙”，难道石经在金代还曾有过第四次搬迁吗？骆氏是由金人元之人，所言必有根据。但是，为什么要迁徙？迁向何处？既然迁徙，为何石经仍留在原地？或者反过来问：如果是迁徙而来，那迁徙之前石经又在何处？所谓“悉以摧仆”，是自然灾变，还是人为所致？对此骆氏均未交待，只给我们留下这寥寥10个字的谜。而且这次迁徙之举不见于其他碑刻和史籍。石经在当时是碑林的主体，直到今天，仍是碑林中最重要的藏品，石经之迁徙

应是碑林史上的大事,研究碑林历史,就不能不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在这里,笔者试从分析当时历史背景和具体历史事件入手,设法寻到这个谜底。

前文已说过,1227年即正大四年,攻灭了西夏的蒙古军乘胜入陕,围攻凤翔,京兆告急。1229年即正大六年,窝阔台继承汗位,亲率大军,开始对金朝施以致命的最后打击。1231年即正大八年(辛卯)春,凤翔城被攻破,京兆已不可守。不久,金军主动放弃京兆,退守潼关,迁民于河南^①。自此,潼关以西尽为蒙古军占领,蒙、金之间的主要战场转至汴京周围。从时间上看,骆天骧所说的“正大辛卯迁徙”,与金军放弃京兆恰好为同一年。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所立《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碑,在追述此前宣圣庙状况时也称:“京兆旧有宣圣庙,辛卯弃城,殿宇倾颓”。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所立《大元重修宣圣庙记》碑亦云:“国初辛卯岁,乱离城弃,殿宇仅存。”所说的都是正大八年。看来,所谓“迁徙”肯定与弃城有关。因为京兆系主动放弃,可以这样推测:在最后弃城之前,当有一个逐步撤退的过程。除居民东撤外,城中的贵重财物、图书典籍也应在东迁之列。很可能,当时曾有过一个搬迁石经的计划。为了搬迁,石经被全部推倒,准备运走。大概由于战局的变化或计划的更改,搬运未及进行或搬迁石经之议又被否定,于是金朝的京兆地方当局便扔下“悉以摧仆”的石经,弃城东撤了。

石经之搬迁,并非没有先例,原立于洛阳太学的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在经历多次变乱后,其劫后幸存者就曾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被迁移至邺城^②。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又由邺城迁回洛阳^③。隋开皇六年(589年),复又自洛阳迁至长安,后因乱废为柱础^④。汉、魏石经就是在这一次次搬迁中越搬越少,毁失殆尽的。“靖康之变”时,金兵也曾将汴京大和殿中的10件“石鼓文”拉回了中都(今北京)^⑤。所以,金朝军政当局在主动撤离京兆时,试图将《开成石经》这样重要的文化遗产一同东迁,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正大辛卯迁徙”便不是对碑林的一次整修,而是一次人为的破坏,“悉以摧仆”当然系入为所致。石经迁徙未成,仍留原地,实在是石经之大幸,碑林之大幸。不然,西安碑林会从此失去它最重要的藏品,更可能的是,碑林会从此不复存在,而《开成石经》本身则很可能象《熹平石经》、《正始石经》一样,“流离失所”,毁失于战乱之中,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将不是这部保存完好的石刻典籍,而是流散于各地的残石了。

三、 元代对碑林、府学和文庙的整修

蒙古国初占陕西时,仍称今之西安为京兆府。忽必烈即位建元后,作为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元朝统一全国后,至元十六年(1279年)京兆府改名安西路,作为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所和安西王建藩之地。皇庆元年(1312年)废安西王府,又改安西路为奉元路,依旧为行省治所。在蒙古入统治关中130余年间,对碑林、府学、文庙的整修,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应有8次。其中,专门整修碑林者2次,专门整修文庙者3次,整修府学、文庙兼及碑林者3次。现以年代先后为序,分述如下。

1、蒙古国初占陕西时期的3次整修

现立于碑林第3室的元至元十三年《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碑,除主要记述至元七至八年对府学、文庙及碑林的整修外,还回顾了此前蒙古国初占陕西时期的整修情况。此碑文残损很多,金石著作中以罗振玉编《金石萃编未刊稿》所录碑文最全,尚能知其大略。碑